

## 【岁月留痕】

□饶毅

我生活的江西南昌到上世纪70年代不仅肉类缺乏,而且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目前常见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

我瞎猜,邓小平被打倒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可能也很心疼,虽然他两个最小的孩子在1977年前都上了大学,但很能体会全国家庭都希望孩子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有些人不关心全国的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有些人在行动上实际堵死全国很多读书好的青少年上大学之路,导致很多家庭灰心、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个国家的广大青年没有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那一届是十年来第一次不被遣送农村的高中“毕业生”。

1977年秋宣布高考入学办法后,青少年有了希望,全社会掀起学习的热潮,社会风气很快改善。我们明显能看到,突然从原来“学生读书无所谓、老师怕流氓”的情况(我有位男性班主任曾被流氓

## 【若有所思】

□李明阳

电影《决裂》于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后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代表作。电影的主要故事是这样的:1958年抗大出身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到松山办抗大式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其间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办学方针与严重脱离生产实践的学究式资产阶级办学理念做坚决斗争。影片放映之时,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学校出钱,连续包映了三次这部思想教育片。2000年后,在教学科研过程中,我与江西前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师有过不止一次交流,所以对当年又红又专的办学理念印象极深。

“文革”期间,不但大学这样,小学也如此,又红又专的办学理念贯穿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小学一、二年级,我们上半天文化课,另外半天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小学同学中的“黑五类”子女尽管积极要求进步,但是仍然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学校入住工宣队,每年都会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到学校进行忆苦思甜报告。那个时候,我的大姐正在上中学。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小学只有5年,初中、高中合起来只有4年,课程没有那么多,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学习时间很短,到工厂、农村锻炼的时间却很多。我记得大姐中学的主要课程有两门,分别是《农业基础》、《机械原理》。《农业基础》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养猪、养牛、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化肥及农药使用方法;《机械原理》的主要内容是农业拖拉机的维修方法、工厂万吨水压机工作原理。

大学的办学更是把这种又红又专的理念发挥到极致。那个时期,综合大学极少,大部分是专业院校,如农学院、林学院、医学院、畜牧

## 记忆犹新的高考数学题

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题,不知道是谁出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学生打过臀部,其他学生看到了但不敢说出是谁打的),变成了大家都集中精力学习,流氓学生几乎销声匿迹,老师得到尊重。这里说的流氓是在校外偷东西、恶性打架者。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闹事的人逐年增加,恶性的流氓与日俱增。我看到过小偷把手伸进农民的口袋偷钱,也看到过流氓在商店用刀割顾客的包。当国家不给青少年希望时,恐怕这些是必然。恢复高考政策宣布后,这种风气很快改变,当然不是没有小偷和流氓,而是减少了很多,他们耀武扬威走街串巷的情况立即消失了。

老师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教学专长的老师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以前很多老师教学不积极,恢复高考招生后,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启用原来埋没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边站多年的老教师,这时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老校长或教务主任。有位教了几年体育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数学老师,因为他的专业本来就不是体育;有位教了几年党史的老师

也回到了他本职的英文教学岗位。

那时缺乏纸张,复习书特别走俏,如果有全套复习书,可能就很有利。我在中学和后来的复习中,从来没有及时得到应该有的书,因为买不到。可能印刷厂也来不及印这么多,以前排长队买食品变成了排长队买书。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他们七兄妹中唯一没在“文革”前读大学的,恢复高考后成为77级大学生。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级,她上大学时,我听到她一声叹息,说竟然差不多和我这个比她小很多岁的外甥一道读大学。如果不是被不负责任地耽误了,她的人生不知道要好多少。后来她的儿子是数学天才,“走遍中美都不怕”。

1978年考数学时,有道“三角形ABC三内角成等差数列”的题目坑了我。我在复习时做过一道题,其中除了这句话,还有另一线索提示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一线索,当然没找

到。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做得不顺利了。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题,不知道是谁出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大一的第二学期,家里安排我悄悄到外地(樟树)中学复读。但其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而威胁我父母要曝光。那时大学录取了便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当时并没对我完全说清楚原因,只说不得已要我回大学继续读。因为翘课的原因,我没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阴差阳错的是,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却与我三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

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课程对我来说有些内容有用,但不多,因为我并不准备做医生。1983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1985年出国。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 从电影《决裂》谈起

我这个出身国企工人家庭,连韭菜与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学会了割麦、插秧、打谷、车水。



学院、工学院。按照教育要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农学院被放到了农村,林学院被赶到了林区,工学院则办到了工厂。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取消,改由工厂、农村、部队基层单位推荐,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要紧密结合地方的生产实践。南方山区道路崎岖,主要牲畜是牛、猪,那么主要专业课程应该要如何养牛、养猪,而不是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在办学理念上,反对高楼大厦,强调勤俭持家。记得我的大学老师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大学教授打报告给系主任,申请购买一台高精度分析天平,老红军出身的系主任在报告书上批示:都是称东西,为什么不购买一个价值仅仅几十元的磅秤呢?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中国的教育理念发生了180度的华丽大转身。小学、中学自不待言,大学的变化

更大。专业院校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化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我有时和同事开玩笑地说:林学院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天晓得这样的学生跑到生产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至于“红”的培养方向,更是被金钱、权力所异化,“宁在宝马车中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当代年轻人价值观的真实写照。今天的高校,SCI论文压倒一切,一个学美术的艺术类教师为职称可以去炮制在化学期刊上发表的SCI论文。

“文革”产生了很多不堪回首的人间悲剧,已经被彻底否定,然而,在教育理念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这个出身国企工人家庭,连韭菜与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学会了割麦、插

秧、打谷、车水。因为中小学又红又专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工作后,我多次深入山区、林区的林场、农户、林业站调查,因为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的缘故,多次被有关部门领导邀请作为专家参加一些林业方针政策制定前的研讨。在参加国家部委召开的专家研讨会时,我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同行专家悲哀地说:不超过10年,等我们退休时,这样的会议就无法举行了。因为,目前高校新进的的基本全是到学校到学校、缺乏林业调查规划实践经验、对林区基本情况不了解的学术研究型教师。

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现象看似奇怪,仔细分析,是文化使然,民族素质使然,经济发展水平使然。只要国情不变,这种后人可发一笑的闹剧还会演绎N次。

(本文作者为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了,你东拉西扯,不是睡懒觉、“切”包子,就是学跳舞、看电视,要不就是夹个席子谈恋爱,有点正事没?在学校里主要是学习,你不谈谈当时热火朝天学文化、学知识的优秀的人和事,曲师岂不成了风月场所了?我接受这个批评,我得谈点学习的正事。

要说学习,先得说考试。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学得进,一考试立马就能看出来,可谓高下立判。78级有不少考试高手,大学四年,大小考试几十次,门门都能拿优秀,我真是佩服。我对考试有本能的恐惧,这是考大学落下的病根,一到考试时,就胃酸拉稀。当然,不会现场表演,不然洋相就出大了。按理说,进了大学,也没有人逼着你非考100分不可,60分足矣,但在那几个考试高手前面照着,你分数低了是躲不过去丢人现眼的。所以,考试事大,不可掉以轻心。

考试难,其实也不难,说穿了就是死记硬背。我至今不明白,文学属于人文科学,又不是数学,直来直去,一加一等于二,怎么可能会有标准答案呢?但我们那时,包括现在的文科考试,都是有标准答案的,考好的关键就是一个背的功夫,脑筋好,记忆强的人就沾光。我这个人脑壳不小,记忆功能不行,从小好忘事,背书无异于把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吐出来,那多痛苦啊。由于半脑残,不得不走点旁门左道,比如事先把考试可能出现的一些要点记在小纸条上,掖

## 【曲师杂忆】

## 唯一的不及格

□荣剑

在身上的某个部位,考试时偷着拿出来参考下。有人马上会说,你这是作弊啊。事是如此,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反正现在曲师的老师也不会把我的分再扣回去了,我就如实交代吧。

有次好像是考文学史,哪个老师主考我忘了,复习的重点实在太多,记不胜记,抄在小纸条上,密密麻麻的变成大纸条了,你没法偷偷拿出来看啊。咋办?人不能被尿憋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把考试要点都抄在草稿纸上,考试时看哪个切题就直接放在桌上,不藏着掖着,看起来就像是刚写出来的。主考老师走到我桌旁,拿起那个稿纸看,有点纳闷,我笑着解释,是刚写的答题提纲。大概他实在想象不到会有这么大胆的作弊行为(我真不愿意用这个词来定性我的行为,但确实找不出更恰切的词来替换它,权且用之),不再深究,狐疑地慢慢溜到别处。感谢这位老师以君子之心对我,只要稍有警惕性,我的狐狸尾巴就会被当场抓住,那丢人可丢大发了。

对曲师的考试制度,我也不完全是消极对待,偷鸡摸狗的事毕竟难上台面,没有正当性,只能偶尔为之。考政治经济学时,我觉得这是我的长项,我既不死记硬背,也不抄些纸条作应急处理,我想完全用自己的理解,高分拿下这个考试。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因为同学都知道,在中文系,唯有我的哲学和经济学的造诣最高,自我感觉很好,那时我就写出了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论文,考个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课,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拿到卷子一看,果不其然,太简单啦,死不了几个脑细胞,我信马由缰地写了起来,洋洋洒洒几大篇,信心满满地交给老师。

分数下来了,大跌眼镜,我不及格,59分。严重的是,全班就我一人不及格,这大概也是中文系78级自入学以来所有考试中的唯一不及格。打击太大了,自尊心受不了了,也不服气啊,这个教育制度大成问题了。我就去找老师论道。教政治经济学的是个女老师,抱歉已忘了她姓啥,只记得她是我们系教古汉语的马老师的夫人。我去她家,马老师也在,知道我的来意,两口子多少都有些不屑,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我是有备而去,为名而战,据理力争,甚至放出话锋,愿意把我这张答卷寄到中国青年报去,作一个案例,让全国人民看看中国考试制度是否合理。这么说是有震慑力的,老师也不知事情闹大后水的深浅,先软了下来,不再和我一般见识,对着标准答案,逐题给我加了一些分,最后加到七十几分,算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现在想来,曲师老师厚道、通情达理、不固执己见,对诸如我这种无中生非、不守规矩的学生还是非常宽容的。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